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2026. 1

VOL.19 NO.1

公共行政 评论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
(A刊)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刊

2月15日出版

2026年第1期 总第109期

●专栏：人工智能

- 专栏导语：面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行政 吴建南 1
- 人工智能时代的街头官僚：理论前沿与研究展望
..... 黄 晖 马太平 吴建南 4
-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一个跨学科的整合性框架
..... 陈丽君 张诗敏 26
- 手段与目的之间：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公共行政组织悖论？
..... 臧雷振 张 端 46

●专栏：应急管理与公共安全治理

- 复杂适应系统下政府应急协作网络适应性研究：基于北京市“23·7”特大
暴雨的社会网络分析 钟 爽 陈莫菲 郑桂贤 63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缘何失灵：基于事故调查报告的扎根分析与案例解释	易承志 彭 洋	83
网格员-居民互动如何强化城市安全隐患排查的合作生产：基于我国 456 个 镇街的实证研究	刘昭阁 李向阳 乔立民	100
需求驱动、注意力牵引与政府危机学习的外溢效应	唐 雲 王 英 洪瑶瑶	122
 ● 论文		
治理情境与政策选择：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地方差异性路径研究	管 兵 林 笑	141
使用移动政务如何改善政府信任：一项因果推断和机理检验	毛万磊	160
健康行为失灵的内涵、形成机理与基于行为公共政策的治理策略	孙 菊 韩文晶 李浩森	178
 ● 英文目录与摘要		196

健康行为失灵的内涵、 形成机理与基于行为公共政策的治理策略

孙 菊 韩文晶 李浩淼*

【摘要】 提高健康干预的有效性对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关键在于采取有效措施弥合个体“意图-行为差距”，因此对健康行为失灵的研究极其必要。论文首先梳理和把握健康行为失灵的基本内涵与现状，在理论层面剖析健康行为失灵的关键影响因素，从“理性-情感-能力-情境”四维度构建个体健康行为失灵形成机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从行为公共政策视角讨论治理健康行为失灵的逻辑与优势。论文在“主体-工具-叙事”三维治理要素框架下，依据治理维度与治理目标的差异，将不同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及叙事方式进行动态组合，匹配形成应对不同成因的健康行为失灵的治理策略，如认知偏差纠正策略、社会支持引导策略、能力内核培育策略、行为惯性打破策略等。

【关键词】 健康行为失灵 基本内涵 形成机理 行为公共政策 治理策略

【中图分类号】 R197.1; R055;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1-0178-18

一、问题的提出

健康是人最重要的可行能力和创造价值的源泉，是劳动生产和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健康行为干预被视为一种极具成本效果的措施（Cawley & Ruhm, 2011）。大量证据表明，保持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如不吸烟、充足的体育活动、健康饮食、不饮酒或适度饮酒，有利于降低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的风险（Peng et al, 2024）。事实上，我国政府早已深刻认识到促进健康行为的战略意义，并明确了个体和政府在建设健康中国进程中的角色分工。长期以来，政府积极扮演政策制定者、环境营造者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制定了一系列疾病防控政策，实施多种多样的健康教育与促进计划，为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改善个体健康行为创造必要条件。如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共建

* 孙菊，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健康治理研究中心教授。通讯作者：韩文晶，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浩淼，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共享、全民健康”作为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强调“加强健康教育”“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并明确指出“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个人的积极性相结合”。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将“参与健康行动”作为基本路径之一，提出“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并要求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合理膳食行动、全民健身行动等一系列重大行动。不难看出，我国政府持续努力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期望通过普及知识、改善环境和提供支持，赋能个体更好地履行其主动获取健康知识、规避健康风险，并最终将健康知识转化为日常行为实践的主体责任。然而，个体在获得政府提供的健康知识和环境支持后，就一定能水到渠成地形成健康行为吗？事实并非如此。

通常认为，人具有有序偏好、完备信息和完全的计算能力，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进行理性决策（胡鞍钢、杭承政，2018）。因此，只要居民掌握足够的健康知识及慢性病的预防理念，形成改变不良行为的意图，就能有效改变其健康行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居民掌握健康知识甚至已经拥有健康行为意图而不采取实际健康行动的行为失灵现象普遍存在。尽管经过多年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行动，我国居民健康意识得到显著改善，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升，已由2012年的8.8%上升到2024年的31.87%（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监测与评估部，2025），但不良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依然流行。调查显示，2024年我国15岁以上居民吸烟率为23.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9.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5）；身体活动普遍不足，2018年业余静态行为时间平均为每天3.2小时，明显高于2010年的每天2.7小时；近年来居民膳食结构仍不尽合理，全谷物、水果、豆类摄入量低，与推荐量有较大差距，脂肪供能比却持续上升，家庭人均每日烹调用盐和食用油摄入量仍远高于推荐值（国家心血管病中心，2025）。

行为的发生包含意图形成和意图翻译（将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两个阶段，这一概念形成于20世纪早期，在20世纪中期得到极大的发展。自那以后，强调意图形成的健康行为模型受到广泛关注，如社会认知理论、健康信念模型、计划行为理论等，这些模型基于“理性人”假设，以个体的行为意图作为预测和解释行为的核心变量（Sheeran，2002）。相应地，传统的健康行为干预措施也大多聚焦于意图形成阶段，重视信息与知识的提供，以重塑个体态度、意识与动机，以期实现行为转变。大量的研究也确实表明，人的行为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预测因素是行为意图（Rhodes & Yao，2015），如果一个人要改变行为，那么首先形成行为改变的意图是至关重要的，但广泛存在的行为失灵（巨大的意图与行为之间的差距）表明，形成了改变意图也并不能保证行为一定会改变（Sheeran & Webb，2016）。近年来，随着对健康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意图翻译过程，探寻意图与行为关系中的潜在调节因素（Conner & Norman，2022），以寻找新的行为干预路径或靶点，有效弥补传统政策手段的局限性，提高健康行为的干预效果。

过去 10 多年间，以“有限理性”为假设的行为科学在公共政策中得到广泛应用，大力提升了政策有效性（Heap, 2017），也催生出新的一种理论范式——行为公共政策，推动了公共政策研究向行为科学的转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等国，以及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等国际组织，纷纷成立专门的行为科学研究小组，参与公共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朱德米、李兵华，2018），在改变和塑造人们行为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其中，大量研究集中在健康行为改变方面，如 2012 年和 2013 年英国政府高调开展“Stoptober”（戒烟）活动，促成了 35 万次戒烟尝试，节省了 10400 个质量调整生命年，每年价值 415 英镑（罗伯托、河内，2020）。国内关于行为公共政策的研究多数聚焦于节能环保（方学梅等，2023）、养老储蓄（刘欢等，2019）等领域的助推策略或政策工具设计，部分文献开始尝试探索健康行为领域的助推策略，如癌症筛查（金乐帆、张宁，2025）、健康饮食（李佳洁、于彤彤，2020）等。

遗憾的是，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国内基于行为公共政策视角的健康行为干预研究较为缺乏，尤其对健康行为失灵的关注意识明显不足，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有针对“健康知识-行为差距”的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健康知-行差距”约为 2.16 : 1，即 2.16 个知晓健康知识和理念的人中有 1 个会采取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高其法、王军慈，2013），但探究意图与行为差距的研究鲜见，仅有极少数研究尝试探索锻炼意图转化为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高雨彤等，2024）。此外，当前研究中可以预测和揭示健康行为失灵及其形成机制和过程的分析框架尚不明晰，还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健康行为失灵的理論分析模型，并在理解个体行为决策复杂性的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开发和创新有效的治理策略。

为此，本研究尝试梳理和把握健康行为失灵的基本内涵与现状，理论剖析健康行为失灵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发生机理，从行为公共政策视角厘清健康行为失灵的治理逻辑，并进一步探索构建治理策略，以有效弥补传统健康行为干预手段的局限，弥合“意图-行为差距”，回应重大现实需求，为提升健康行为干预的有效性、取得更长远和稳定的健康绩效与经济绩效，以及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研究借鉴。

二、健康行为失灵的内涵与现状

（一）健康行为失灵内涵

“健康行为”的定义最早由 Kasl 于 1966 年提出，其关注重点在于疾病的预防。1992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健康四大基石”，即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并指出这四点可解决 70% 的健康行为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健康行为的概念逐步扩展，健康行为的范围从早期的预防疾病慢慢延伸为促进和维护健康，是人们为保持或增强自身健康、预防健康问题或获得积

极的身体形象而进行的活动 (Cockerham et al., 1993)。

构建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学通常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可以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决策,因此只要掌握足够的健康知识,形成改变不良行为或养成良好行为的意图,就能有效改变健康行为,用过程链条可以阐释为“拥有知识—形成意图—产生行为”,在行动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总结归纳形成新的健康知识或进一步强化意图,进而促进健康行动的持续发生,实现干预的闭环和路径循环(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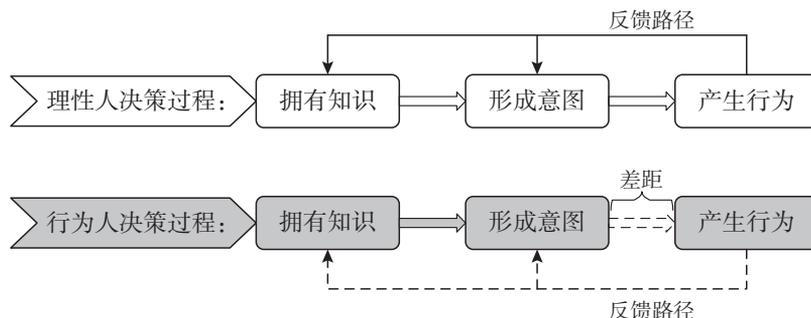


图1 行为失灵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但行为经济学挑战了这一假设,认为现实中的人是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和有限自利的。基于双系统模型,人类大脑运行着两种行为决策模式,一套是无意识的、自动的、快速的,被称为系统1,即“经验-直觉”式思维系统;另一套是有意识的、慎重的、缓慢的,被称为系统2,即“理性-分析”式思维系统。在多数情况下,由于认知能力局限以及贪婪、冲动、惰性等特点,人们大部分行为都是无意识地依赖系统1的快思考(黄湛冰、刘磊,2020),因此常常非理性地做出与自身福利不相称的低效决策,这种现象被称作“行为失灵”(Behavioral Failures)。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行为经济学家提出,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领域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关注,主要是指人们不按照理性原则进行决策和行为,导致个体福利无法最大化(Viscusi & Gayer, 2015)。在实证研究中,行为失灵被操作化为“意图-行为差距”(Zhang et al., 2019),即意图、行为不一致。这一差距意味着无法实现“拥有知识—形成意图—产生行为”的闭环,更不能形成行为反馈实现路径循环,由此可能带来行为干预投入的边际效益下降和干预政策失效等后果。

在健康领域,个体在健康行为决策中的“意图-行为差距”被称为“健康行为失灵”,即个体有采取良好健康行为或放弃不良健康行为的意图,但实际上没有真正落实或实际行为与预期不符。“意图-行为差距”越大,意味着健康行为失灵程度越深,健康行为发生和维持的可能性越小,而健康行为干预政策的有效性也将随之大打折扣。

(二) 健康行为失灵现状

根据已有的健康行为实证研究,在健康行为中,意图只能解释18%~23%的

行为差异 (McEachan et al., 2016), 个体的“意图-行为差距”在戒酒、戒烟、运动、饮食等行为中普遍存在, 而且差距很大。例如, 在运动行为方面, 有运动意图的人中有 46% 的人最终不会进行任何运动, 而且这是一种稳健的、可重复的心理活动 (Rhodes & Bruijn, 2013)。一项澳大利亚的调查显示, 虽然吃蔬菜和水果的好处众所周知, 但许多人并没有坚持这些建议, 在 15 岁及以上的人群中, 44% 的女性和 54% 的男性没有达到推荐的每日水果摄入量, 而 90% 的女性和 93% 的男性没有达到建议的每日蔬菜摄入量 (Allom & Mullan, 2012)。

上述这些针对国外人群的研究结论在中国同样存在。例如, 在遵医行为方面, 社区中老年高血压患者遵医服药行为意向对行为的解释率仅为 27% (万莹等, 2012), 中老年糖尿病患者遵医服药行为意向对行为的解释率为 29% (陈国玉等, 2013), 受伤运动员康复遵医意图对行为的解释率为 28% (苏荣海等, 2019)。在运动锻炼方面, 大学生体育锻炼意图对锻炼行为的解释率仅为 16% (陈建峰, 2017)。

由此可见, 健康行为失灵现象的确是广泛存在的, 即便通过健康教育等措施让居民掌握了健康相关知识, 并形成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的意图, 也仅有一部分人会采取实际行动。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健康行为失灵的关键成因及干预措施, 以缩小“意图-行为差距”, 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三、健康行为失灵的形成功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一) 理论基础

个体健康行为决策的相关理论十分丰富, 如被广泛应用的健康信念模型 (Health Belief Model, HBM)、社会认知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跨理论模型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健康促进生态学模型 (Ecological Model of Health Promotion, EMHP) 以及新兴的多理论模型 (Multi-Theory Model, MTM) 等, 都揭示了个体行为发生或维持的关键影响因素及逻辑结构, 表明个体行为除了受一般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影响外, 还会受到人的需要、动机、信念、态度、情绪、自我效能、社会情境 (如社会支持、物质环境、政策环境、媒体宣传等) 等多方因素的作用, 这些理论为指导健康行为的干预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

而健康行为失灵是个体做出的与自身福利不相称的低效决策, 是实际健康行为与健康目标及意图的背离。解释健康行为失灵为何形成, 本质在于厘清行为意图转化为实际健康行为的过程链条, 既要考虑意图的形成阶段, 也要关注意图向行为转化的阶段, 这两方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二者在解释“意图-行为差距”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从意图形成端看, 强烈的意图或稳定的意图更能预测行为, 从而减少意图和行为之间的差距, 因此需要聚焦影响意图强弱及

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从意图转化过程看，可能存在阻碍或促进意图向行为转化的重要机制，因此需要寻找影响意图转化为行为的中介机制及调节变量。结合对已有文献的全面回顾，本文将重点阐释关注意图形成及其与行为关系的主要理论模型，并以此作为健康行为失灵生成机理分析的理论基础，包括计划行为理论、时限性自我调节理论以及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PB）是从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延伸而来，认为实际行动的发生由个体主观意志决定，即受前置因素——行为意图的影响，行为意图又受到个体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且知觉行为控制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实际行动。其中，行为态度由行为信念、行为结果评估共同决定，主观规范反映了他人或团队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体在执行某行为时所感知的难易程度。若个体行为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越有利、知觉控制力越强，行为的意图就会越强烈，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该理论提供了个体健康行为产生的理论预测，认为意图可以很好地预测行为，着重解释了影响行为意图的关键变量，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意图不能很好地转化为行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扩展研究，加入了各类影响因素以增强该模型的解释力，如过去习惯（Norman & Smith, 1995），等等。

时限性自我调节理论（Temporal Self-Regulation Theory, TST）在主观期望效用模型、理性行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意图向行为转变的过程（Sallis, 2010），核心要素包括意图强度、实际行动、一致性观念、时限性价价、自我调节能力和行为优势。其中，一致性观念（指行为本身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和时限性价价（指该行为是否有益以及预期效益是在短期内还是长期后获得）共同影响意图（Hall & Fong, 2015），行为优势（指内部生物驱力、外部环境线索及过去行为习惯）与自我调节能力（如自我控制、执行能力）（Davis et al., 2020）在意图转化为行为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也会直接影响行为转变。该理论不仅关注理性、抽象的健康意图，而且更加关注非理性的变化过程（Chew et al., 2020），解释了个体面对即时奖励与长期目标之间冲突时的行为决策，对弥补意图与行为间的鸿沟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但其缺点是过于强调时间因素和行为优势，忽视了其他层面因素的影响，需要进一步丰富 TST 结构的新要素。

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HAPA）在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等理论上发展成熟，将健康行动过程细分为无意向阶段、意向阶段与行动阶段。无意向阶段即个体没有行动的打算，意图受风险知觉、结果期待和行动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意向阶段表明个体已经形成行动的打算并制定相应的计划，计划包括行动计划（何时、何地及如何执行）与应对计划（对障碍以及克服障碍的可替代行为的预期），被视为意图与行动之间的中介变量，仅受保持自我效能的持续影响；行动阶段的个体已经采取行动并受保持和恢复自我效能的调节，行为的维持、退出与恢复取决于各种障碍与可用资源。HAPA 理论用计划

来解释意图向行动的转化，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意图与行动之间的鸿沟，通过描述执行意图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为政策干预提供了可操作的中介变量，但该理论仍存在一些争议，即过于强调行为发生的阶段性，忽略了过去经历等重要因素的作用。

以上经典理论提出了影响个体健康行为意图及实际行为发生的多种因素，并给出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尤其时限性自我调节理论弥补了传统健康行为理论模型在时间观上的欠缺，同时，该理论与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还关注了意图转化为行为的过程，对解释个体健康行为失灵的形成提供了有益支撑。然而，目前尚未有理论模型能全面、系统地阐释个体“意图-行为差距”的具体成因。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健康行为相关理论演变，已经反映出研究者们认识到健康行为改变的复杂性，且已涉及不同层面影响因素的广泛讨论，如个体理性层面的态度、信念、期望、主观规范等因素，感性层面的自我效能感、认同感等因素，能力层面的计划、执行、自我控制等因素，以及情境层面的外部环境线索、社会支持等因素。但很少有研究将这些关键要素进行归类总结，放置在同一框架下探究在个体决策过程中，即意图形成以及转化的过程中，理性、感性、能力、情境四维因素的作用方式。

在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并不是由这四维因素中的某一个维度所独立决定的，而是不同维度共同影响健康行为的意图形成和行为转化过程。例如，个体仅有理性意识，但缺乏感性动力、个人能力或有利情境，健康行为也难以发生或维持；若个体仅有感性冲动，但缺乏理性思考、执行能力或合适情境，健康行为也可能是短暂的。将四维因素放置于同一框架下解构个体的行为决策机制，是全面理解行为复杂性的必要之举。因此，研究亟须在综合视域下，基于个体意图形成环节及行为决策过程，探索并构建出健康行为失灵形成的整合性理论分析框架。

（二）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为更加清晰地描述“意图-行为差距”的发生机理，考虑现有理论的优劣势、模型膨胀问题以及理论之间部分内容不可比的现实困难，本文尝试折中地改进理论建构技术，对以上理论模型进行整合。时限性自我调节理论模型关注了个体对可能发生的行为结果的看法，如对行为本身的价值、成本或收益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还考虑了行为价值或益处是短时间内还是很长一段时间后获得（即时间观），这在解释个体行为意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同时，该模型明确了意图转化为行为阶段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选择以时限性自我调节理论的架构为基础，并依据研究重点对该理论框架进行适当调整。

首先，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意图转化为行为的过程机制，无须考虑行为优势及自我调节能力变量对实际健康行为的独立影响，因此本研究删除了二者直接影响实际行为的路径。其次，结合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的优势，引入“计划”作为意图与行为间的中介变量，但非必经之路。最后，在基础逻辑链条上增加新的变

量，如自我认同感、自我效能感，以丰富 TST 的结构和要素，弥补其过程机制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形成一个全面阐释健康行为失灵发生机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自我认同感被定义为个体用来描述自己的标签，是一种行为预测的重要附加变量。研究表明，自我认同感能对个体内部的影响机制（如意图对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起到潜在调节作用（Carfora et al., 2017）。自我效能感则强调个体对自身能力与行动的感知和信心（Bandura, 1977），具有动机效应（比实际知识更能预测动机），而动机更能预测未来的参与，高自我效能感的人会产生更高的目标，压力和消极情绪也更少（李雪莲、周子涵，2024）。因此，将自我认同感变量和自我效能感变量纳入研究模型，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分析个体健康行为意图与实际行动决策的关系。

至此，本文聚焦健康行为产生的两个阶段，参考相关理论模型中的关键要素及经验研究的重要结论，对影响健康行为意图形成及其转化的因素进行维度区分，探索建构基于“理性-感性-能力-情境”四维度的个体健康行为失灵发生机理分析框架（如图 2 所示）。理性维度主要强调个体基于逻辑和推理做出决策的过程，感性维度主要侧重个体情绪和主观感受对行为的影响，能力维度主要涉及个体执行特定行为所具备的技能和资源，情境维度主要考虑一系列环境等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在模型中，一致性观念、时限性效价体现个体理性因素，自我认同感、自我效能感反映个体感性因素，计划、自我调节能力体现能力因素，行为优势反映情境因素。自我认同感可以用个体对自身身份（如将自己视为锻炼者、健康饮食者）和认同感的主观感受来评价，计划包含行动计划（如行动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和应对计划（即应对可能遇到的障碍的可替代方案）两部分，自我调节能力测度的是自我控制能力和执行能力，行为优势具体强调过去习惯和环境线索（如物理环境、社会支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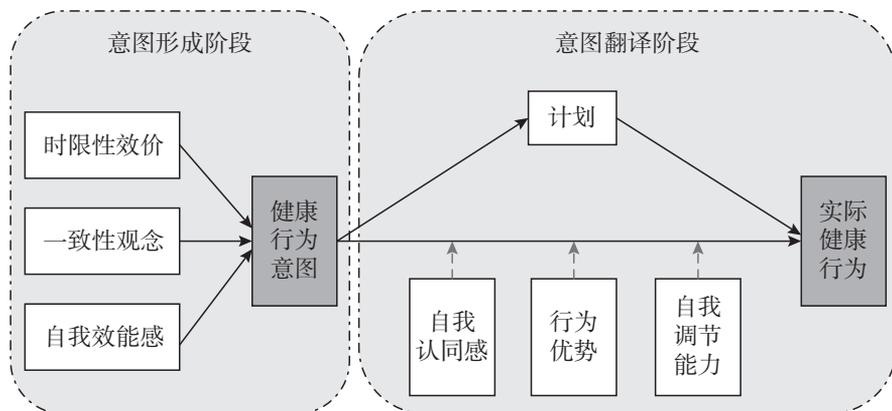


图 2 基于“理性-感性-能力-情境”四维度的个体健康行为失灵形成机理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健康行为失灵的产生是个体理性、感性、能力以及情境这四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维度解决的关键问题存在显著差异。在意图形成阶段，主要焦点

为采取健康行动的意愿，即“想不想做”，核心在于动机是否产生，通常由理性和感性维度主导，如个体通过计算成本收益、深思熟虑后形成意图，或由情感驱动绕过理性思维直接产生意图。在意图翻译阶段，主要焦点为意图转化为行为，即“能不能做成”，核心在于执行障碍能否解决，一般由能力和情境维度主导，如个体不具备执行健康行为的技能、坚持下去的能力以及良好的支持环境，那么健康行为意图很难落实到具体行动。因此，本研究将四维因素按照行为发生的内在逻辑、核心作用点，分别置于决策模型的不同阶段。在整体行为决策链条上，一致性观念、时限性效价、自我效能感会直接影响健康行为意图，计划在意图和实际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自我认同感、行为优势和自我调节能力均调节意图与实际行为的关系。例如，“我吃得健康就可能得病”的一致性观念越强，或个人认为健康饮食有益且获益时间越短（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自我效能感越强，则越能产生健康行为意图，提高健康行为发生概率，进而缩小“意图-行为差距”。若个体对自己健康饮食者的身份越认同，计划性、执行力及自我控制能力越强，过去习惯、外部环境越有利，个体的健康“意图-行为差距”也越小；反之，“意图-行为差距”越大。

四、健康行为失灵的治理视角：行为公共政策的独特优势

（一）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理论起点更契合“人的本性”

相较于自我利益驱动下的“理性人”假设，“有限理性”驱动下的“行为人”特征才更贴近现实世界中的个体，其决策是一个由理智与情感共同支配的过程，实际行为的发生也是理性认知因素与非理性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李燕等，2021），同时还受个人能力因素及所处环境等因素的多重影响。行为公共政策本质上就是以“有限理性”为假设的行为科学在公共政策中的应用，强调政策工具设计过程中关注人类行为综合模式的特征（郭跃等，2020），通过行为科学的手段，以隐性方式（张书维等，2019）达到改变个体行为的目的，以此改善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

个体健康行为的“有限理性”恰恰是造成意图与行为鸿沟的重要原因，需要突破传统思维模型来稳固和强化健康意图与行为间的联系。行为公共政策理解个体行为决策中存在许多非理性因素，开辟出不同于“过度干预”和“过度放任”的“第三条道路”——“温和型自由家长主义”，提供了更为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干预方式（满小欧、张雨，2024），这为克服个体的健康行为弱点（即“意图-行为差距”）、引导人们做出理性的健康决策提供了新思路。实践也证明，基于行为公共政策视角的健康干预策略确实具有优势。例如，饮食行为研究中，学校将苹果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会增加学生的选择，改善零食包装大小能减少零食摄入量，等等，这种通过增加吸引力、便利性或规范性的干预方式，比人为限制某人的食物购买要有效得多（罗伯托、河内，2020）。

可见，弥补“意图-行为差距”，不能让意图者仅仅停留在意图阶段，而是要驱动其采取实际行动，基于“现实的人类行为”而非“理性经济人”假设来制定行为治理策略，将“行为人”假定作为健康干预的逻辑起点，既认可个体做出健康决策时的理性一面，也强调这种理性的“有限性”，合理制定措施，有效配置资源，是治理个体健康行为失灵的重要手段，也与行为公共政策的思想基点不谋而合。

（二）以助推为主的政策工具能提升健康行为干预的成本效益

相比传统的健康干预政策，行为公共政策视角下提出的助推工具对于健康行为促进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助推（Nudge）是在对人非理性心理的精准把握基础上，保持个体的选择自由，以一种非强制性的干预方式，通过创设特定情境，改变选择架构，直接干预个体行为（Thaler & Sunstein, 2008）。助推包括默认型助推（设置默认选项）、简化型助推（使用在线工具）、显著型助推（加粗关键字段显示等）、社会型助推（与其他同类人群比较）等（任兵等，2024）。助推通常能在短期内以顺势而为的低成本方式实现行为改变，同时具有可逆转、易推广、灵活性等优点，便于在群体层面展开干预，即使干预措施存在问题，取消后的损失也较小。

在实践中，仅仅将最健康的食物摆在最前面，最不健康的食物放在最后，就可以降低就餐者选择不健康食物的概率（Wansink & van Ittersum, 2013），提供绿色的碗盛放食物就能显著降低就餐者的总能量摄入（Friis et al., 2017）。反复影响行为的助推可能在无形中培养政策目标群体的能力，进而养成行为习惯（Espinosa et al., 2022），产生持久的行为效果。与之相似的助力工具主张利用人的认知可塑性，通过简捷启发式的教育来提高个体决策能力，实现行为改变（刘永芳，2022）。即使干预措施被取消，干预效果仍会持续存在，弥补了助推工具易逆转的缺陷，用更低的认知成本延长了政策执行效果。有学者指出，助力是助推的衍生品，二者局部重叠，殊途同归（张书维等，2018）。

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揭示，行为公共政策相关理论工具可以为健康行为干预提供理论支持和研究借鉴。基于行为公共政策视角探索健康行为失灵的治理工具，扩展了传统治理方案的干预范式，通过温和、提醒式的反复助推，能支持和引导健康意图者采取实际的健康行动，有利于以低执行成本获取高社会收益，提升健康干预政策的成本效益。

（三）基于心理认知机制的叙事策略有利于强化个体政策认同与遵从

叙事在诸多领域中都被视作一种改变个体态度和行为的有效方式。政策叙事可以理解为政策制定者使用的一种语言和故事（Jones & McBeth, 2010），通过讲述特定的“故事内容”或运用一些“表达技巧”，能引导和说服公众遵循某种行动。传统上，健康行为干预政策的信息传递往往不够灵活生动，这一点恰恰是很

重要的。行为公共政策正是在借鉴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工具的过程中，不断审视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从聚焦静态政策工具的设计到关注政策形塑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的动态过程，即引入叙事以进一步捕捉公共政策动态影响微观个体观念与行为的触发机制（郭跃等，2020）。运用恰当的方式在适当的时机传递准确的健康信息，使受众更好地理解、认可和接受健康干预内容，对缩小健康“意图-行为差距”，取得理想政策效果尤为重要。

在实践中，可以使用故事内容的叙事方式引导或激活个体情绪以促进健康行动，如通过讲述吸烟造成的危害后果（包括对自己及家人的危害）的故事，说服吸烟者戒烟；也可以通过讲述成功戒烟者的故事，激励其他人戒烟。或者运用框架效应的表达技巧来激发人的损失厌恶心理，从而达到健康行为干预的目的。如汉堡肉可以被描述为“有20%的肥肉”，也可被描述为“有80%的瘦肉”；乳腺影像检查可以被描述为“如果进行乳腺影像检查，那么你将获得及早发现乳腺癌的最佳机会”，或者“如果不进行乳腺影像检查，那么你将失去及早发现乳腺癌的最佳机会”（李晓明、谭谱，2018）。显然，不同的干预信息表达方式会影响个体的收益感知及决策偏好，进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行为治理效果。

因此，对健康行为失灵进行治理，不能忽略叙事在政策执行中的重要性，需要结合目标群体特征、考虑实际场景特征，策略性、差异化地构建相关的叙事方式，通过传播特定的故事内容，运用适宜的表达技巧，去影响和塑造个体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意愿，并促使其更愿意采取期望的行为，以达到更好的政策干预效果。运用叙事策略将复杂的健康干预与政策内容再生产为更易被理解和更好接受的信息，既是治理个体健康行为失灵的内在要求，也是行为公共政策的优势所在。

五、行为公共政策视角下健康行为失灵的治理策略

基于“理性-感性-能力-情境”四维度下的健康行为失灵成因剖析，以及行为公共政策视角治理健康行为失灵的独特优势，本文将进一步探索构建应对不同类型的健康行为失灵状态的精准化治理策略。健康行为失灵的治理显然无法通过单一的线性流程或一个部门来解决，即不仅是卫生系统作为服务提供者和公众个人作为服务使用者的简单互动，而且涉及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公众个体、基层组织乃至家庭成员等多元主体的网络关系，需要在非线性的政策干预过程中整合多方信息及资源并通力合作，才能使问题真正得以化解。因此，必须遵循优势互补的协作逻辑，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合理匹配不同治理主体与功能定位，形成治理健康行为失灵的强大合力。

鉴于此，本文结合行为公共政策的关键性工具与叙事技巧，尝试从主体、工具、叙事三个层面，根据治理维度与治理目标的差异，将不同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及叙事方式进行动态组合，匹配形成多样化的健康行为失灵治理策略（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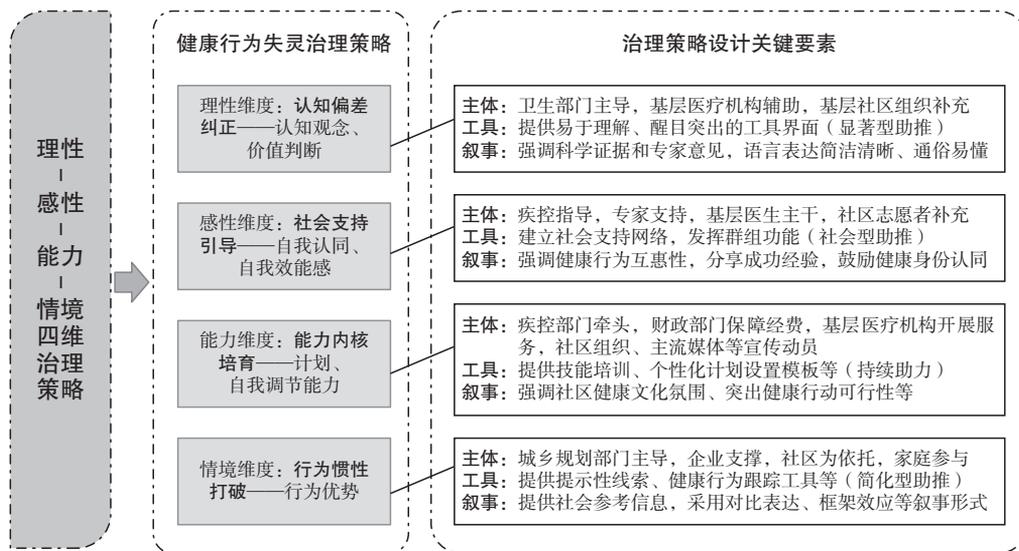


图3 健康行为失灵的治理策略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基于理性维度的认知偏差纠正策略：通过理念渗透强化个体理性思考

认知偏差纠正策略主要作用于健康行为失灵形成的认知观念、价值判断等理性因素，即将科学、准确、易于理解的健康知识及行动理念渗透于个体的现实生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健康价值观念及行为态度转变，纠正个体的认知偏差，促进个体意图向实际行为的转化。在主体层面，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部门是宣教科普的权威单位，基层医疗机构是连接健康服务供需双方的主要阵地，社区组织能作为有效补充。在工具层面，应以准确的宣教信息内容为基础，以简单明了、易于理解、醒目突出的工具界面为载体，通过强化健康信息吸引力、提高健康信息可及性等显著型助推或助力工具，来促进公众健康行为的改变。在叙事层面，应强调科学证据和专家意见，采取明确清晰、通俗易懂、乐于接受的叙事方式，选择恰当的时间、地点传递科学指引，促进个体对健康行动的理性认知及价值认同。

具体而言，可以由国家或各省市的卫健委等部门制定和完善科学的健康行为教育指南，并将健康行为干预的宣教内容合理嵌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等关键政策乃至基层治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通过基层医生、社区管理者等关键人物，在服务过程中因时因人因地制宜地“直译”或“转译”相关科普内容。同时，利用好现代媒介，运用官方媒介（如微信公众号、健康小程序、微博号、抖音号等）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借助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学者、社会团体中意见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通过互联网渠道以直播、转播、视频发布、图文转载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披露健康信息与具体操作指南，依托大数据画像技术精准高效地推送至目标群体，传递科学准确的健康行为指引和风险信息

提示，形成“线上+线下”双轨并行的认知偏差纠正策略。

（二）基于感性维度的社会支持引导策略：通过关怀融入强化个体自我认同

社会支持引导策略主要作用于健康行为失灵形成的自我认同、自我效能感等感性类因素，即通过提升个体采取健康行为的内在自信与认可，提升意图水平及其转化效率，缩小个体“意图-行为差距”。在主体层面，疾控中心是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的主导部门，心理健康专家等服务团队拥有专业的诊疗技术，是心理服务质量与效果的重要保障；基层医生是日常诊疗服务供给的一线人员和掌握患者情感动向的关键人物，社区志愿者队伍具有友爱亲民、组织灵活的特性，是转译政策话语、输出居民诉求的重要桥梁。在工具层面，可以通过建立社会支持网络、设置分享交流群组等社会型助推工具，提供关怀活动、爱心服务，以增进个体健康行动的信心。在叙事层面，应该注重情绪包容和正向引导，通过强调健康行为互惠性、承诺和分享同类人群的亲身经历，以及鼓励健康身份认同等话语表达技巧，引导个体角色克服自我怀疑，形成和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从而增强其健康行为意图及其稳定性。

具体而言，可以由疾控中心牵头指导，探索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衔接的关爱计划，在平台创建、活动开展、技术运用等方面提供资源支撑，将服务对象信息与健康档案、慢病管理、医保信息系统进行匹配对接，开展近端心理会诊与远程心理服务等活动。专家团队定期走进社区、走进校园，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常规性诊疗项目互补互促；社区志愿团队通过网格群等线上平台，以及上门服务等线下形式与居民进行交流沟通，传递积极的情绪态度，讲述健康行动的成功经验，以增强个体的行动信心与决心。

（三）基于能力维度的能力内核培育策略：通过技能传授强化个体自我调节功能

能力内核培育策略主要作用于个体健康行为失灵形成的计划与自我调节能力因素，即通过加强个体在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应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促进其健康行为意图向实际行动的转化。在主体层面，卫健委、疾控中心等部门发挥统筹协调、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等作用，财政部门是健康治理项目经费支持的重要来源，基层医疗机构可以建立完备的工作小组开展服务工作，社区组织、主流媒体等具有深入社会、联系公众的天然优势，是治理工作前期进行宣传动员的关键力量。在工具层面，可以通过自我管理技能培训、技巧教学、达人示范、个性化计划设置等助力工具促进个体健康行动能力的培养。在叙事层面，应强调健康行动的可行性，突出行为后果，引导个体积极掌握健康知识 with 技能，从而增强其健康行为转变的实践能力。

具体而言，可以由卫健委、疾控中心等部门主导开发技能培训课程、示范性教学视频以及建立个性化反馈机制，增强个体自我观察、学习模仿、计划设置与

监督调整的能力。同时，可以施行“健康行动积分制度”，并将积分管理工作纳入公共卫生行动计划。财政部门可以进行专项拨款用于相关课程研制及“健康行动积分制度”的推广和持续推进。社区组织、主流媒体负责项目开展前的动员活动，培育健康行动带头人、宣传健康行动达人，树立行动标杆。居民通过积分制度激励、榜样示范等方式持续提高自身对健康行动的关注，并在被动参与过程中，从观察技能到学习效仿再到习得技能，最后能适应性地运用技能，逐步养成主动执行和反复进行的内驱力，最终形成持久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执行能力。

（四）基于情境维度的行为惯性打破策略：通过环境塑造提供持续性线索提示

行为惯性打破策略主要作用于健康行为失灵形成的习惯因素与环境因素，即通过中断、控制或打破触发不良习惯的情境诱因，塑造有利于良好习惯养成的支持性环境，让健康的选择变得更加容易，促进个体健康行为意图向实际健康行动的转化。在主体层面，城乡规划部门是改善基础设施的关键主体，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商、健康服务管理平台运营等企业机构是技术赋能、平台赋能的核心支撑，基层社区是创造支持性健康行为环境的基本单元，家庭成员、社交伙伴等社会公众作为健康促进行动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发挥监督他人和自我监督的双重功能。在工具层面，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数字化手段拓展健康监测与管理场景，通过健康行为追踪工具等人工智能监测设备提供实时监测、提醒及信息反馈服务，创造持续性的情境激励与信号引导。在叙事层面，可以通过风险信息提示、角色标签化、对比表达、提供社会参考信息等表达技巧，营造浓厚的健康行为促进氛围。

具体而言，可以由城乡规划部门积极改善城乡、社区基础设施，实施健康社区创建项目。相关企业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群体，以及适应学习、工作、休闲等不同应用场景的便捷性健康行为追踪工具、健康应用程序，以及设计社区自助式健康管理终端平台等。运用智能化健康行为监测设备来强化行动提示与计划提醒，助推个体健康意图向实际行为转化。最后，应重视健康支持性环境的建设，充分发挥同伴、家人的监督、提醒、互促功能。

六、结论与讨论

提高健康干预的有效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弥补“意图-行为差距”，因此健康行为失灵的研究极其重要。本文在把握健康行为失灵概念内涵与现状特征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健康行为干预相关的主要理论模型，归纳总结出个体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四个维度——理性-感性-能力-情境，并构建了一个健康行为失灵形成机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面对现实个体健康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及其复杂影响机制，传统健康干预手段往往低效或失效。而基于行为科学原理和“行为人”特征设计干预工具的行为公共政策，为治理健康行为失灵提供了新的思路，其助

推工具有利于弥补传统政策措施难以应对个体失灵、行为偏差等问题的局限性,引入瞄准微观个体心理机制的叙事要素有助于强化个体认同与政策遵从。因此,从行为公共政策视角出发,探索制定健康行为失灵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一项有益的尝试,同时也必须考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健康治理的重要性。为此,本文试图在行为公共政策视角下,着眼主体、工具、叙事三个层面,探究健康行为失灵的治理策略,如认知偏差纠正策略、社会支持引导策略、能力内核培育策略、行为习惯性打破策略,为充分利用不同学科的优势解决复杂的健康治理难题提供新方案。

值得说明的是,健康行为失灵的形成功理与治理策略是复杂且相互关联的,为有效促进健康行为的改善,需要采取多维度或综合性的干预措施。尽管本文尝试从不同维度给出一般化的治理思路,但不同策略间可能并不是完全割裂、互不干扰的,而是各有侧重以着力解决各维度下的焦点问题,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有许多细节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规划的,本文并不能在此详尽。

此外,基于理论推导的健康行为失灵形成功理尚需验证。虽然我们可以从国际个体健康行为决策研究中获得一些洞见,但因文化、价值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制定循证的健康行为治理政策需要以立足我国现实情境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但目前国内对健康行为失灵的严重关注不足,因此,后续需要持续加强相关研究,以验证和揭示我国健康行为失灵背后的关键要素,为健康行为失灵研究提供更具本土化和科学性的学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治理策略的田野实验,研制健康行为失灵治理策略的综合应用指导方案,形成本土化、可推广的中国经验,丰富和拓展健康行为干预手段以更好地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参考文献

- 陈国玉、张晓义、赵芳芳、吴静 (2013). 计划行为理论在中老年糖尿病患者遵医服药行为中的运用. *医学理论与实践*, 26(17): 2364-2366.
- Chen, G. Y., Zhang, X. Y., Zhao, F. F., & Wu, J. (2013). The Application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in the Compliance Behavior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The Journal of Med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26(17): 2364-2366. (in Chinese)
- 陈建峰 (2017). 大学生体育学习倦怠影响锻炼行为的实证研究.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37(1): 37-41.
- Chen, J. F. (2017).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Learning Burnout on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Behavior. *Journal of 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 37(1): 37-41. (in Chinese)
- 克里斯蒂娜·A. 罗伯托、河内一郎 (2020). 行为经济学与公众健康. 王健,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Reberto, C. A., & Kawachi, I. (2020).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ublic Health*. (Wang, J. Trans).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方学梅、高煜辰、陈松 (2023). 节能领域的助推干预效果——基于现场实验类研究的荟萃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 16(6): 132-147+199.
- Fang, X. M., Gao, Y. C., & Chen, S. (2023). The Effect of Nudge in the Field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 Meta-analysis Based on Experimental Studi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6(6): 132-147+199. (in Chinese)
- 高其法、王军慈 (2013). 我国居民健康知识与行为分离情况分析. *现代预防医学*, 40(17): 3218-3221.
- Gao, Q. F., & Wang, J. C. (2013). Analysis on Gaps in Health Behavior and Knowledg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40(17): 3218-3221. (in Chinese)
-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2025).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4. <https://www.nccd.org.cnNewsInformation/Index/1089>.

- National Cente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2025). *China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Disease Report 2024*. <https://www.nccd.org.cnNewsInformation/Index/1089>.
- 高雨彤、朱丽丽、张俊梅、孙月 (2024). 锻炼意向对脑卒中患者锻炼行为影响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护理学杂志*, 39(5): 92-95+111.
- Gao, Y. T., Zhu, L. L., Zhang, J. M., & Sun, Y. (2024).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s of Exercise Intention on Exercise Behavior in Stroke Patients.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39(5): 92-95+111. (in Chinese)
- 郭跃、何林晟、苏竣 (2020). “工具-叙事-反馈”: 一个行为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 *中国行政管理*, (5): 71-78.
- Guo, Y., He, L. S., & Su, J. (2020). Instruments, Narrative and Feedback: A Framework of Behavioral Public Policy.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5): 71-78. (in Chinese)
- 胡鞍钢、杭承政 (2018). 论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基于行为科学的视角. *中国行政管理*, (1): 13-17.
- Hu, A. G., & Hang, C. Z. (2018). Promoting China's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Science and Meticulous Governanc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 13-17. (in Chinese)
- 黄湛冰、刘磊 (2020). 轻推式干预未被中国广泛运用的原因: 行为经济学分析.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9(2): 55-68.
- Huang, Z. B., & Liu, L. (2020). Why Nudge Intervention Is Used Rare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9(2): 55-68. (in Chinese)
- 金乐帆、张宁 (2025). 提升癌症筛查率的行为助推干预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33(2): 336-350.
- Jin, L. F., & Zhang, N. (2025). Behavioral Nudg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Increase Cancer Screening Rat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3(2): 336-350. (in Chinese)
- 李佳洁、于彤彤 (2020). 基于助推的健康饮食行为干预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28(12): 2052-2063.
- Li, J. J., & Yu, T. T. (2020). Nudg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Healthy Eating Behavior.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2): 2052-2063. (in Chinese)
- 李雪莲、周子涵 (2024). 青少年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与线下公共参与.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6): 55-65.
- Li, X. L., & Zhou, Z. H. (2024). Adolescents' Self-Efficacy in Current Politic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Offline Publ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8(6): 55-65. (in Chinese)
- 李晓明、谭谱 (2018). 框架效应的应用研究及其应用技术. *心理科学进展*, 26(12): 2230-2237.
- Li, X. M., & Tan, P. (2018). Applied Research on Framing Effect and Related Techniqu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12): 2230-2237. (in Chinese)
- 李燕、苏一丹、朱春奎 (2021). 公民政策遵从研究述评: 基于“政策情境”与“行为特征”的二元视角. *公共行政评论*, 14(4): 175-195+200.
- Li, Y., Su, Y. D., & Zhu, C. K. (2021).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itizen's Policy Compli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Context”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4(4): 175-195+200. (in Chinese)
- 刘欢、隋晓阳、黄元娜、林榕平、许明星 (2019). 行为经济学在养老储蓄领域的助推应用. *心理科学进展*, 27(3): 417-427.
- Liu, H., Sui, X. Y., Huang, Y. N., Lin, R. P., & Xu, M. X. (2019). The Nudging Rol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in Retirement Savings Decisions: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3): 417-427. (in Chinese)
- 刘永芳 (2022). 有限理性的本质辨析与价值之争. *心理学报*, 54(11): 1293-1309.
- Liu, Y. F. (2022). The Essence of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Debate Over Its Valu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4(11): 1293-1309. (in Chinese)
- 满小欧、张雨 (2024). 行为公共政策的工具设计、应用策略与政策效应: 基于类型学的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 17(5): 179-195+200.
- Man, X. O., & Zhang, Y. (2024). The Tool Design, Applica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y Effects of Behavioral Public Policy: A Typolog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7(5): 179-195+200. (in Chinese)
- 任兵、陈志霞、蒋林秀 (2024). 政策情境与工具选择: 行为助推何以促进政策创新. *公共行政评论*, 17(4): 154-

- 176+199-200.
- Ren, B., Chen, Z. X., & Jiang, L. X. (2024). Policy Context and Tool Choice: A Government-People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on How Behavioral Nudge Promotes Policy Innov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7(4): 154-176+199-200. (in Chinese)
- 苏荣海、徐茂洲、马运超、李阔 (2019). 受伤运动员康复遵医意图与行为的作用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混合模型检验.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43(6): 48-60.
- Su, R. H., Xu, M. Z., Ma, Y. C., & Li, K. (2019). Treatment Intention and Compliance of Injured Athletes: A Mixed Model Testing Based on the TPB Theory.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43(6): 48-60. (in Chinese)
- 万莹、徐红、赵瑾珠、任书华、周涛、孙奕 (2012). 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探讨高血压患者遵医服药行为的影响因素.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9(4): 253-255.
- Wan, Y., Xu, H., Zhao, J. Z., Ren, S. H., Zhou, T., & Sun, Y. (2012). Exploring Influencing Factors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Behavior Among the Elderly with Hypertension in Community on the Basis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Medicine*, 29(4): 253-255. (in Chinese)
- 张书维、梁歆佚、岳经纶 (2019). 行为社会政策：“助推”公共福利的实践与探索. *心理科学进展*, 27(3): 428-437.
- Zhang, S. W., Liang, X. Y., & Yue, J. L. (2019). Behavioral Social Policy: Nudge in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Public Welfare.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3): 428-437. (in Chinese)
- 张书维、王宇、周蕾 (2018). 行为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助推与助力：殊途同归.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 15(2): 20-38.
- Zhang, S. W., Wang, Y., & Zhou, L. (2018). “Nudge” and “Boost” from the Behavioral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 All Roads Lead to Rome. *Chinese Public Policy Review*, 15(2): 20-38. (in Chinese)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5). 2024 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和发现. https://www.chinacdc.cnjksjksj04/202506/t20250616_307668.html.
-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25). *Key Findings and Results of the 2024 China Adult Tobacco Survey*. https://www.chinacdc.cnjksjksj04/202506/t20250616_307668.html.
-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监测与评估部 (2025). 2024 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1.87%. <http://www.cche.org.cn/portal/gzdt/xwzx/2025/1/1b3242b5dc3447b29bb3d394a7889b38.htm>.
- Th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hina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2025). The National Health Literacy Level of Residents Reached 31.87% in 2024. <http://www.cche.org.cn/portal/gzdt/xwzx/2025/1/1b3242b5dc3447b29bb3d394a7889b38.htm>.
- 朱德米、李兵华 (2018). 行为科学与公共政策：对政策有效性的追求. *中国行政管理*, (8): 59-64.
- Zhu, D. M., & Li, B. H. (2018). Behavior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Pursuit of Policy Effectiveness.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8): 59-64. (in Chinese)
- Allom, V., & Mullan, B. (2012). Self-regulation Versus Habit: The Influence of Self-schema on Fruit and Vegetable Consumption. *Psychology & Health*, 27, (Suppl 2): 7-24.
-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2): 191-215.
- Carfora, V., Caso, D., Sparks, P., & Conner, M. (2017). Moderating Effects of Pro-Environmental Self-Identity on Pro-environmental Intentions and Behaviour: A Multi-Behaviour Stud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53: 92-99.
- Cawley, J., & Ruhm, C. J. (2011). The Economics of Risky Health Behaviors. NBER Working Paper.
- Chew, H. S. J., Sim, K. L. D., Choi, K. C., & Chair, S. Y. (2020).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are Adherence, Time Perspective, Readiness to Change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43(4): 533-543.
- Cockerham, W. C., Abel, T., & Luschen, G. (1993). Weber, Max, Formal rationality, and Health Lifestyl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3): 413-425.
- Conner, M., & Norman, P. (2022). Understanding the Intention-Behavior Gap: The Role of Intention Strengt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923464.
- Davis, E. L., Brooker, R. J., & Kahle, S. (2020). Considering Context in the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of Self-Regul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62(4): 423-435.
- Espinosa, V. I., Wang, W. H. S., & Soto, J. H. D. (2022). Principles of Nudging and Boosting: Steering or Empowering

- Decision-Making for 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Sustainability*, 14(4): 1-18.
- Friis, R., Skov, L. R., Olsen, A., Appleton, K. M., Saulais, L., Dinnella, C., Hartwell, H., Depezay, L., Monteleone, E., Giboreau, A., & Perez-Cueto, F. J. A. (2017). Comparison of Three Nudge Interventions (Priming, Default Option, and Perceived Variety) to Promote Vegetable Consumption in a Self-service Buffet Setting. *PLoS One*, 12(5): e0176028.
- Hall, P. A., & Fong, G. T. (2015). Temporal Self-regulation Theory: A Neurobiologically Informed Model for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9.
- Heap, S. H. (2017). Behavioural Public Policy: The Constitutional Approach. *Behavioural Public Policy*, 1(2): 252-265.
- Jones, M. D., & McBeth, M. K. (2010). A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Clear Enough to Be Wrong?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8(2): 329-353.
- McEachan, R., Taylor, N., Harrison, R., Lawton, R., Gardner, P., & Conner, M. (2016). Meta-Analysis of the Reasoned Action Approach (RAA) to Understanding Health Behaviors.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50(4): 592-612.
- Norman, P., & Smith, L. (1995).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Exercis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Prior Behavior, Behavioral Intentions and Attitude Varia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4): 403-415.
- Peng, W. Y., Bai, X. K., Yang, Y., Cui, J. L., Xu, W., Song, L. J., Yong, H., He, W. Y., Zhang, Y., Zhang, X. Y., Li, X., & Lu, J. P. (2024). Healthy Lifestyle, Statin, and Mortality in People with High CVD Risk: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 17: 100635.
- Rhodes, R. E., & Bruijn, G. J. D. (2013). How Big Is the Physical Activity Intention-Behavior Gap? A Meta-Analysis Using the Action Control Framework.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8(2): 296-309.
- Rhodes, R. E., & Yao, C. A. (2015). Models Accounting for Intention-Behavior Discordance in the Physical Activity Domain: a User's Guide, Content Overview, and Review of Current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12(1): 1-14.
- Sallis, J. F. (2010). Temporal Self-Regulation Theory: A Step Forward in the Evolution of Health Behaviour Models. *Health Psychology Review*, 4(2): 75-78.
- Sheeran, P. (2002). Intention-Behavior Relation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2(1): 1-36.
- Sheeran, P., & Webb, T. L. (2016). The Intention-Behavior Gap.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0(9): 503-518.
- Thaler, R. H., & Sunstein, C. R. (2008).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Viscusi, W. K., & Gayer, T. (2015). Behavioral Public Choice: The Behavioral Paradox of Government Polic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38(3): 973-1007.
- Wansink, B., & van Ittersum, K. (2013). Portion Size Me: Plate-Size Induced Consumption Norms and Win-Win Solutions for Reducing Food Intake and Wast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19(4): 320-332.
- Zhang, B., Lai, K. H., Wang, B., & Wang, Z. H. (2019). From Intention to Action: How Do Personal Attitudes, Facilities Accessibility, and Government Stimulus Matter for Household Waste Sort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33: 447-458.

责任编辑：张书维

英文目录与摘要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9 No. 1, 2026

●SYSPSIU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roduc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iannan Wu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Literature Review

..... Hui Huang, Taiping Ma & Jiannan Wu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rofoundly changed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who are critical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olicymaking. How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acts the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has triggered substantial scholarly attention, however a systematic review is scant. This study employ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ology, utilizing the “Discretionary Power—Conditions of Work—Patterns of Practice”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and analyze relevant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prestigio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from 2010 to 2024, thereby revealing the theoretical progress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research in the AI era. First, we find that three key perspectives on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act the discretion power, including the curtailment, empowerment and obscurement. Second, we identify four types of situations which the working conditions ar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rd, we discussed the changing working patterns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with respect to service-level rationing, algorithmic bias rationing and customer compliance. Building on this, we propose three promising research topics for future research. This study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as policy implications on street-level governanc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Grassroots Governance; Discretionary Power; Literature Review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Publ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ve Framework Lijun Chen & Shimin Zhang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l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widespread use have quickly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nd practical discussions. Ongoing progress and discussions surrounding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ggest its potential to transform the processes, functions, and activities of publ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is paper aims to illustrate the impact of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on publ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the relevant research progres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provide a framework and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ceptual impl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ey bring to publ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nhanced decision-making and precise forecasting, improved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efficacy, motivation stimulation, and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se technologies: biases and ambiguous accountability arising from data and algorithm risks, alienation of individual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s, AI technology aversion, and the “uncanny valley” effect. The article constructs an A-TP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impact of new-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on publ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utcomes, consisting of four aspects: technology, individuals, tasks, an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uggests several promising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ublic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pportunities; Challenge

Between Means and Ends: How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hapes Paradox of Public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Leizhen Zang & Duan Zhang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is reshaping the operating logic of public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Technology no longer functions merely as an instrument of execution; by participating in problem definition and decision generation, it reorders policy goals and their pathways of implementation. In optimizing means, GAI may simultaneously reshape ends, transforming the means-ends tension within public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from a latent conflict into an institutionalized paradox. Drawing on an organizational paradox perspective, this study develops a two-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technological agency and goal alignment—to examine how organizational paradoxes are activated and how they are amplified or absorbed through feedback loops. Based on a case study,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while GAI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responsiveness of public governance, temporal misalignments between authority boundaries and goal systems often generate implementation dilemmas and goal drift. By contrast,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s—such as clarifying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clustering issues, and adapting governance practices to contextual conditions—can absorb technological tensions and shift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from defensive to receptive strategies, thereby converting paradoxes into sources of learning and reform momentum. A further typological analysis identifies four ideal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paradox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technology-dominant, goal-suspended, dual-misalignment, and intelligent-synergistic—and proposes governance pathways centered on systemic coordination, iterative adjustment, and uncertainty absorption. This study extends the explanatory scope of organizational paradox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tive AI governance, clarifies the role of GAI as a driver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offers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Generative AI; Organizational Paradox; Means-ends; Paradox Governance

● **SYSPOSIUM: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Public Safety Governance**

Adaptability of Government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Networks under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Based on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23 · 7” Flash Flood in Beijing

..... Shuang Zhong, Mofei Chen & Guixian Zheng

Abstract In a risk society,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within government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addressing complex risk events. However, how does the government’s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network rapidly form and adapt to situat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major disasters, and what are its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process-structure” adaptability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ory, using the response to the heavy rainstorm in Beijing in July 2023 as a case study. It appli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to identify the adapt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ment’s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network at three stages: pre-event, during the event, and post-event, from the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 and task.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Emergency plans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for actual 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networks, with the core organizations and key tasks in the plan occupying central positions in the actual networks; (2) As the risk situation evolves, the network form, key organizations, and core tasks of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exhibit an evolution from loose coupling to center-periphery to loose division of labor; (3) Real organizational and task demand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updated plan network after the disaster through crisis learning. Additionally, based on the case, the study further summarizes the triple adaptability logic of the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network: first, adaptability based on the original plan; second, adaptability based on dynamic risk situations; and third, adaptability based on crisis learning, with the adaptability at different stages being interconnected.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adaptab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logic of the government’s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Beijing flood case, providing a policy basis for enhancing the government’s adaptive capacity to respond to disasters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Key Word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Emergency Cooperation Network; Adaptabilit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hy Does Emergency Response to Emergent Events Fail: Grounded Analysis and Case Explanation Based on Ac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s Chengzhi Yi & Yang Peng

Abstract Emergency response failure is a complex governance issue with multiple causes. Existing research often holds a hierarchically closed perspective that emphasizes “letting managers manage” which fails to fully reveal the logical interrelation among different causal conditions. To unpack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response failure, this paper adopts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o extract causal chains of emergency response failure, ultimately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explanatory model based on three-level coding of 54 ac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lockage, failure of the window-triggering mechanism,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effectivenes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deviations constitute the four core causal conditions of emergency response failure. Furthermore, case analysis shows that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erves as a prerequisite for response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Delayed reporting and behaviors such as concealment, omission disrupt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hich may provoke a chain reaction. The failure of the window-triggering mechanism and deviations in emergency handling are key causes of response failure, which are linked by a transmission effect. Emergency plans, safety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other contents are treated as constraints in the response process. If they are executed in a perfunctory manner, the gap between the trigger mechanism and emergency handling will be deepened, accelerating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action process and the expected results. To address and reduce failures in emergency response, efforts can be made across the dimensions of “rule-information-decision-response” by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capacity building, so a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Emergency Response Failure; Safety Production; Ac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s; Grounded Theory; Case Analysis

How D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id Managers and Residents Strengthen the Co-Production of Urban Safety Hazard Investig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456 Towns and Streets in China

..... Zhaoge Liu, Xiangyang Li & Limin Qiao

Abstract In the government-citizen co-production of urban safety hazard investig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ty grid is playing a crucial role, and its effectiveness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grid managers and residents. This article takes urban fire safety as an example, based on monthly panel data from 456 towns and streets in five representati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21 to 2023, combined with activity theory, to study how grid manager-resident interaction affects co-production of urban safety hazard investig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social distance, knowledge tools, and division of labor constraints of two types of subject interacti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grid managers and residents,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subjects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residents reporting safety hazards; (2) The effective deployment of knowledge training and digital platforms can enhance the ability of residents to identify safety hazards and grid managers to handle them,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co-production; (3) The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grid managers constrains th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grid managers and residents, reducing the scale of residents reporting safety hazards; (4)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id managers and resident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production with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high-risk towns and streets. The discussion of empirical result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co-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id manager-resident interaction,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urban safety hazard investigation and co-production, and helps local governments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diverse subjects such as citizens in urban safety management, and better implement the overall goal of joint governance,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Key Words Urban Safety; Hazard Investigation; Co-Production; Grid Manager and Resident Interaction; Activity Theory

Demand Driven, Attention Traction,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Government Crisis Learning

..... Yun Tang, Ying Wang & Yaoyao Hong

Abstract “When one region experiences an accident, multiple parties learn from it; when one area has hidden risks, the entire nation takes warning.” This reflect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crisis learning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ere non-incident local governments can also conduct effective crisis learning from major accidents, achieving knowledge spillover from incident to non-incident areas. So, what is the actual effect of this spillover in government crisis learning? What is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By manually collecting safety production data from 273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cross China from 2010 to 2022 and analyzing it through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he study finds that after major accidents, not only do incident-area governments engage in crisis learning with direct effects, but non-incident-area governments also conduct effective crisis learning, demonstrating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crisis learning is driven by safety demands and guided by safety attention allocation. Compared to public safety demands, government safety demands more effectively drive non-incident-area governments to undertake crisis learning. Additionally, non-incident-area governments focus more on the “relative value” of differences in safety attention allocation with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rather than the “absolute value” of such allocation. Greater hierarchical disparities in safety attention allocation further motivate non-incident-area governments to engage in crisis learning. The intrinsic drive of safety demands (“I want to learn”) and the extrinsic guidance of safety attention allocation (“I have to learn”) jointly shap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government crisis learning. This study reveals and quantifie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crisis learning within China’s government,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cross-organizational crisis learning.

Key Words Crisis Learning; Spillover Effects; Safety Demands; Safety Attention

●ARTICLES

Governance Context and Policy Choice: A Study on the Local Differences in the Path of Government Purchase of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Bing Guan & Xiao Lin

Abstract Local variations in policy types have long been a significant topic in policy research. This study takes the initial policy context of local governance as the core analytical variable, focusing on the domain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t seeks to explain why different cities adopt divergent policy types within the same field. Under conditions of limited resources, local governments implement distinct governance models to balance 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elderly care services, adjusting policy types in accordance with governance tasks. This process reflects both the constraint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behind policy selection and adjustment. The study categorizes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to three types: a social-oriented model led primarily by social organizations, a market-oriented model dominated by enterprises, and a hybrid model featuring a relatively equal mix of both. Shanghai, Chongqing, and Guangzhou are selected as representative cases for each of these three typ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ince the early 2000s, the initial practices and policy approaches to service procurement in these cities have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i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These early trajectories have reinforced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haped differentiated paths in elderly care service provision. In terms of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paper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adopting context-specific models for the delivery of elderly care—and public services more broadly—while advocating for dynamic policy adjustments to achieve a sustainable balance between equity and efficiency.

Key Words Home-based Care; Government Purchase of Services; Initial Policy; Governance Context

How Does M-Government Usage Improve Government Trust: A Study of Causal Inference and Mechanism Testing

Wanlei Mao

Abstract Improving government trust in the digital age requires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ether M-government, as a new development and future trend of

E-government, can improve government trust still faces dual challenges: reverse causation and insufficient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M-government usage can improve government trust,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the early development stage of M-government, this paper finds that: first, there is a clear bidirectional causality problem between M-government usage and government trust in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ut this paper confirms that M-government usage can improve government trust by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analysis. PSM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high-frequency user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government trust than low-frequency users. Second, the causal effect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group heterogeneity. High-frequency use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men than on women, and more on members of the CPC than on other groups;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non-public officials, but not on public officials; a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creases, the effect becomes greater. Finally, the mechanism analysis based on the model of public sense of gain indicates that the influence of usage intensity on government trust is not only fully mediated by the three types of service satisfaction, but also the public sense of gain and the three types of service satisfaction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Performance Law” to unify the explanations for causality, group heterogeneity,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That is, technology-driven servic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rofoundly affects users’ government trus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nse of gain is the key mechanism. This paper not only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rust,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and soli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government trust in the digital age.

Key Words Government Trust; M-government; Performance Law; Causal Inference; Mechanism Testing

The Connota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Strategy Based on Behavior Public Policy of Health Behavior Failure Ju Sun, Wenjing Han & Haomiao Li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intervention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The key is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bridge the gap of individual “intention-behavior”, so the study of health behavior failure is extremely necessary. The paper first sorts out and grasp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health behavior failure. Secondly,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lth behavior failure, and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dividual health behavior failure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rational-emotion-ability-situation”. Then, discusses the logic and advantages of managing health behavior fail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public policy. Finall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ubject-tool-narrative” three-dimensional governance elements, different governance subjects, governance tools and narrative methods are dynamically combin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in governance dimensions and governance objectives, and a governance strategy of health behavior failure is formed to deal with different causes. Such as cognitive bias correction strategies, social support guidance strategies, ability core cultivation strategies, behavioral inertia breaking strategies, etc.

Key Words Health Behavior Failure; Basic Connota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Behavioral Public Policy; Governance Strategy

公共行政评论

双月刊，2008年创刊
第19卷，第1期（总第109期）
2026年2月15日出版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imonthly, Since 2008
Vol.19 No.1
Published in February 2026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协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

社 长 肖 滨
主 编 朱亚鹏

联系电话 020-84113029 020-84038746

电子邮件 jpachina@163.com

编辑出版 《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
(广州新港西路135号; 邮编510275)

印 刷 广州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传 真 020-84111478

网 址 <http://jpa.sysu.edu.cn>

Administrat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onsors Sun Yat-sen University

Supporters Centre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ety

President: Bin Xiao

Editor in Chief: Yapeng Zhu

Tel: 86 20 84113029 86 20 84038746

Fax: 86 20 84111478

Email: jpachina@163.com

Website: <http://jpa.sysu.edu.cn>

Edited by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135 Xin Gang Xi Road, Guangzhou, China. 510275)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399, Beijing, China)



ISSN 1674-2486



9 771674 248265

刊号 ISSN1674-2486
CN44-1648/D

邮发 国内46-364
代号 国外BM8839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定价: 20.00元